

爱国商人郑观应及其教育思想

周小喜*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4)

内容摘要: 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 郑观应有着独特的商业资本家身份。他在《盛世危言》中提出从政治、经济、教育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其教育思想百年之后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郑观应; 商人; 《盛世危言》; 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52(2009)02-0061-03

一、郑观应及其著作《盛世危言》

郑观应 1842 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雍陌乡的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 原名官应, 其祖父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封建文人, 父亲则“敝屣科名, 设帐授徒”; 是有着家学渊源的村塾教师。^{[1] [2]} 生长在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的郑观应, 科举求仕仍然是他的首要选择。他 17 岁时在香山应童子试, 未中。因为家中成员众多, 光兄弟姐妹就有 17 人, 家庭经济负担沉重; 也因为香山是“买办故乡”, 经商致富者不乏其人, 郑观应家族中就有几个亲朋是高级买办, 为郑观应从商开辟了道路。郑观应遵循父命, 放弃读经仕途, 到上海学贾经商, 先在其叔父新德洋行买办郑廷江处一边“供走奔之劳”, 一边学习英语。18 岁入宝顺洋行, 管楼楼兼管轮船揽载, 正式开始买办生涯。期间, 他仍继续学习英语。在宝顺洋行的十年间, 除了做分内的事情外, 他自己还承办了和生祥茶栈, 并伙同其他人与外商经营公正轮船公司, 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个人资本。19 世纪 80 年代前后郑观应一边做买办, 一边以其数以万计的巨资投资近代民族工业, 诸如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电报局等。郑观应又由高级买办变成了颇具声望的民族资本家。

郑观应的一生, 经历了习贾而买办而高级买办, 最后成为民族资本家的过程。脱离买办职务后, 他当过中国电报局总董事、轮船招商局帮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 直到他去世前一年, 即 1921 年 80 岁高龄时, 仍任招商局董事。应该说, 除了因太古洋行亏

欠受到牵连而消沉, 一躺三年而外, 从 17 岁到临终, 郑观应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商务事业。

夏东元先生《郑观应传》书里提到两件事, 其一, “1870 年 3 月, 在皖捐局捐升郎中, 双月选用”;^{[1] (P13)} 其二, “1879 年 1 月, 由晋赈案内捐以道员, 双月选用”。^{[1] (P13)} 这两件事说的自然是郑观应捐纳为官的事实, 但笔者认为, 郎中与道员的官衔可以看作郑观应商务事业中的点缀, 也恰是他事业成功的证明。从 17 岁到 80 岁 63 年生涯中, 商业资本家绝对是他第一位的职业, 官衔只是因其影响而成就的政治资本。同时, 官衔的捐得, 也说明了三件事: 第一, 郑观应在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儒生, 他对清政府抱有希望, 虽然弃学从商, 但仍热衷于仕途; 第二, 其能力、思想以及“乐善好施”在当时影响很大, 影响到了清廷, 郑观应其人得到了清廷的信任; 第三, 可以见出郑观应的精明所在, 他从与盛宣怀等人的密切交往中, 深深地认识到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 从而把政途上的晋升视为发展个人资本的有利的必要条件。

与郑观应同时代的思想家代表还有冯桂芬、薛福成、王韬等, 葛荣晋先生曾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评价: 在洋务运动中, 以买办起家的郑观应是一位商业资产者。尽管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无论在洋务运动还是在维新变法运动中都有深刻影响, 但特定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洋务活动与变革思想不在本书的视野内。冯桂芬、薛福成、王韬是洋务思想家中的典型人物, 亦是封建士大夫以传统经世之学应付时艰的

*收稿日期: 2009-01-15

作者简介: 周小喜(1966—)女,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人文艺术系讲师。

重要代表,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实学史不可忽略的内容。^[2]葛先生把郑观应与冯、薛、王分别出来,认为后者是洋务思想家中的典型人物,“亦是封建士大夫以传统经世之学应付时艰的重要代表”,而将郑观应列为另类,究竟归哪类,不得而知。笔者以为此种观点颇令人费解。拿郑观应与王韬来说,其思想有相近的地方,在提倡学习西方格致科学以富国强民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在“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上他们更为相投,王氏还曾经就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提过建议,作过序,何以郑观应不能与王氏一样列入实学思想史中的人物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1840年—1900年60年的思想变化过程中,中国是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士大夫为主体的,而郑观应应乡试不售,17岁即弃学习贾,既无师承,又无致力于经世之学的研究等等的记载,而且终其一生从事商业活动,这就得出一个结论,郑观应不属于封建士大夫之列,而应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商人。

那么,与众不同的郑观应,他是怎样一个商人呢?他具备一个商人的一切素质,而且出类拔萃;他又具备了其他商人所少有的素质,他是一个富有强烈爱国思想、负有民族责任感,并尽自己所能为富国强民献计献策的著述颇丰的知识分子,这是其他商界人士绝难企及的。郑观应生活的年代,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人们思想更是变幻莫测,无所适从。郑观应一落地就闻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弥漫的硝烟。他从小生活的香山县雍陌乡,与香港遥望,与澳门相邻,侵略者的炮击、讹诈与蹂躏,广州人民对侵略者的反击,他都亲眼亲历,在他心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他以民族屈辱感,激起他强烈的爱国心。他说: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接交,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3] (P12-13)}郑观应把这种激愤与屈辱化成民族责任感,他关心时务,热心学习西学,期以革除积弊。正是有这颗忧时爱国之心,郑观应从70年代初,就开始有计划地写作,“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每于耳酣酒热之余,闻可以安内攘外者道,感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4] (P173)}于1875年将所成文章编成《易言》一书。《易言》虽是郑观应的早期作品,但其中爱国图强的思想是非常突出的。现试列举一二:《论边防》、《论传教》等篇指出侵略形势的严重;《论吏治》、《论练兵》、《论水师》等篇揭露封建积弊的黑暗;《论税务》要求关税自主;《论交涉》反对治外法权;《论商务》、《论机器》等篇主张打破禁例,允许人民用机器制

造,设制造等厂。

随着时间的推移,郑观应在实践中发觉昔日所论多未透彻,于是修订改写《易言》增添先后所论洋务55篇。1893年,中国近代最受欢迎影响最大的书也是当时讲维新变法最完整的书——《盛世危言》面世。《盛世危言》之所以引起轰动,一是正逢中日甲午战争之时,中国人需要这样一部书;此外更重要的,是书中的痛切时弊与维新强国唤起了国人强烈的共鸣。

二、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及其影响

在王尔敏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他这样评价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商战”之意义,经郑观应之分析发挥,立即显露其时代精神,与其丰富深远之内涵。以对积弱积贫之中国,正是指出当代与未来应当努力追求之方向。^[5]作为商人,作为中国近代商务思想醒觉之先知,之首要前驱,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一整套的“商战”理论及著作中其他有关经济上的见解与建议,凸显了特定历史时期先驱们敏锐的洞悉力与独到的思想,确有其时代精神。但是,如果郑观应只有经济方面的著述,他的《盛世危言》可能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作为商人,郑观应奇就奇在能从全局考察,深层次地挖掘近代中国存在的问题,经济之外,在政治、教育、外交、军事、司法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并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改造方案。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论述已有不少,今暂且避开其他,单单分析郑观应的教育救国思想。

首先,郑观应把教育提升到救国图强的首要位置。议院政治一直是郑氏特别重视的强国之本,与议院相提并论的是教育。他说:“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3] (P13)}政治上实行君民共主外,还必须“教养得法”,要做到“教养得法”,就必须兴学校,人尽其才,讲农学,地尽其利,造铁路,物畅其流。教育养成问题被郑氏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郑氏认为泰西之所以强于中国,是因为西人“驯致富强”有一套方法。用中国的体用关系说,“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这是西人的体;“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这是西人的用。^{[3] (P13)}也就是说,西人把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和教育作为首要的根本的立国之本,在这一立国之本的前提下,用坚船利炮而致国家富强,“船坚炮利”是西人“体”所发的“用”,是“体”发挥作用的结果。中国呢?“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因此,“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道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这里的“体”或

“本”就是指政体和教育、学堂。

其次,他提出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四书五经为登第仕途的唯一教科书。在这样的制度下,“为师者类皆迂儒老生,终身从事于章句之学,帖括之艺。试问以五洲形势、列国政治、历朝史鉴、诸子百家、天算、动植、形声、格致之学,皆懵然漠然,不知所对”;学生则从黄口小童始,先诵读《大学》,继而《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读竣,又习五经。然膏继晷,朝夕从事于斯,彼其用心将为考试之题目耳,制艺之取材耳,于义理无所讲究也,于文法无所留意也。故有读书六、七年徒以多记为功,不辨菽麦;故名为读圣人书,学圣人道,实则蠢愚迂谬不可响迳,腹笥空虚毫无心得”。^{[3] (P22-23)}如此读书之人,“方今各国之人航海东来”,又如何去抵御外侮呢?因此,郑观应大胆而明确地指出废八股,重西学。“是以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并以胡林翼、曾国藩为证:“若夫胡、曾诸巨公,皆少年登第,抛弃八股敲门砖,重研精于经济之学,故能出身加民,立功不朽”。^{[4] (P280)}众所周知,中国的科举制度于1905年才最后被废除,而郑氏该文作于1875年,比科举制度的最后废除早了30年。于此,我们不能不佩服郑氏看问题之深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劣势分析之透彻,不愧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伟大的先驱。

再次,广兴学校,建立新式学堂。找出中国教育落后的症结之所在后,郑观应进一步提出,要造就于国有用的人才,必广兴学校。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3] (P9)}自强之道,以育人为本;求才之道,以设学堂为先。郑氏认为,古代有家塾、庠、序、国学,形式多样,层层递进,所以成材者众,后世学校之制度,为科举所驱使,所以才“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邑”。^{[3] (P9)}只要中国广设学校,就不会落后于泰西各国,“泰西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3] (P30)}教育乃兴国治国之本,这与现在的“教育兴国”何其相似。

最后,增设女塾,提倡女子教育。《盛世危言》

中,郑氏特辟一《女教》篇,批斥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唐观点,痛陈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酷虐残忍,揭露了妇女裹足这一中国仅有的陋习对妇女的残害。他认为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中国应为妇女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因材施教。他不无痛心地说: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3] (P33)}郑观应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妇女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现实,对受压迫的妇女寄予极大的同情并力图改变这种局面,他充分肯定了妇女有无异于男子的聪明才智,看到了妇女受教育对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所起的巨大作用,他的这些言论,对受压迫几千年的妇女来说,无异于当空霹雳,振聋发聩,它唤醒了中国妇女的自尊心,为近代中国妇女求解放吹响了第一声号角。

无论是呼吁废除科举制度,还是提倡广兴学校,建议增设女塾,郑观应都走在时代的前列,他的思想无一不是从分析中国的现状出发,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代表当时的思想潮流,为维新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教育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郑观应在一百多年前就能够洞悉这一问题并提出一些精辟的见解和合理的建议,他的教育兴国思想及其影响不止于当时那个时代,在此后乃至当今社会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夏东元. 郑观应传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 [2] 葛荣晋主编. 中国实学思想史(下卷) [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3] 郑观应. 盛世危言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 [4] 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5] 王尔敏.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On Patriotic Businessman Zheng Guan Ying and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ZHOU Xiaoxi

Abstract: Zheng Guan Ying, a thinker in modern China, was a unique commercial capitalist. He proposed a lot of resolutions on reform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educational system and so on in China in his work *The Motto of Golden Age*,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Although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have come into being over 100 years, they still have meaning of realistic guidance today.

Key words: Zheng Guan Ying; Businessmen; *The Motto of Golden Age*; Educational Thoughts